

华岗政治大课与19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

徐 畅 刘雪松

摘要: 为了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文教政策,使山东大学顺利实现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学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校长华岗亲自为全校师生讲授政治大课。华岗校长讲授政治大课,理论联系实际,全面系统又通俗易懂,极大地提升了师生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开阔了眼界,拓宽了研究领域,为19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关键词: 华岗; 政治大课; 山东大学; 1950年代; 学术范式转变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1.04.017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亲自为师生们开设政治大课,系统地讲授党的政策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提升了广大师生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开阔了眼界,拓宽了研究领域,为1950年代山东大学(以下简称“山大”)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对此,学界多有著述,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①。但是仍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如关于华岗讲授政治大课的背景,没有结合山大教师状态和华岗教育思想进行论述;关于政治大课的概念,既没有界定其外延和内涵,也没有叙说其发展演化过程;关于政治大课的特点,还没有进一步总结和提升;关于政治大课的作用,没有全面分析它与山大1950年代“二次辉煌”的关系等。事实上,华岗的政治大课既是山东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的珍贵遗产,对当下中国高校政治思想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背景、过程、特点与影响四个方面,深度解读华岗讲授的政治大课,分析其与1950年代山大辉煌的关系,阐明政治大课的当下意义和价值。

一、华岗政治大课的开设缘起

华岗在山大开设政治大课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贯彻新中国教育方针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是改变山大教师思想和心态的现实需求。当然,华岗的教育思想是重要的主观驱动因素。

1. 贯彻新中国教育方针的迫切需要

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国家政权更替之后,必然对其进行改造。1949年9月29日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

作者简介: 徐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济南250100;xuchang@sdu.edu.cn);刘雪松,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250100;super_songsong@163.com)。

^① 关于华岗的政治大课,相关著述中有亲历者的回忆,如孙思白的《怀念你,华岗校长》(《山东大学报》1988年5月31日,第4版)、司兆乐的《我在山大学辩证唯物主义》(《山东大学报》1996年10月16日,第4版)、赵俪生的《我和华岗校长的接触以及我对他的理解》(《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有从解放思想角度的分析探讨,如《山东大学百年史》编委会编写的《山东大学百年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有的则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孙宜山的《华岗学术思想研究——革命语境下的求真探索》(山东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2-107页)等。

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等^①。为了贯彻新中国的教育方针,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代中期,高教部颁布了若干开设马列主义公共课的文件,要求在全国高校开展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1950年6月,毛泽东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②。该年七八月份,高教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把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教学重点。1952年,高教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列为主要课程^③。和其他大学一样,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大学也面临着从旧教育体系向新教育体系转轨的问题,即如何全面贯彻落实《共同纲领》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努力把山东大学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新型大学。“建设新民主主义新山大”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核心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师生的头脑。为此,山东大学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校师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2. 改变教师思想和心态的现实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山大教师的思想和心态极为复杂。首先,不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而心存疑虑。因为不了解新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接管方针,绝大多数教师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是持有敌意;对政策揣测纷纭,担心职业,担心待遇,担心山大改为短期干部学校,因而犹豫彷徨、焦虑不安。其次,很多教师不认同马列主义。当时,山大的文科教师大都在民国时期的国内大学读过书,受传统文化熏陶很深,但基本上没有接触马列主义;理工科教师虽多在国内大学毕业后留学欧美和日本,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对马克思主义也很陌生。正因如此,相当多的教师不认同、不接受马列主义。有人说:“假如山大有买办思想,那么毛主席提倡从国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就是买办的典型吗?”^④有的教师不讲历史唯物论的“主要内容‘阶级’与‘国家革命’”,却将“空洞的‘绪论’与‘唯心唯物斗争史’”讲了一学期三分之二时间;有的教师不把社会发展史“当作政治思想课来教,只是当作‘知识传授’”;有的教师讲授世界现代史时将“空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历史讲的很多,而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则一字不提”,还对学生说“他们的历史你们比我懂的更多,我就不讲他了”;等等。^⑤从历史系“三反”学习代表团对本系教师的批评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与马列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第三,很多教师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同其他高校一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大教师尤其是知名教授,大多留学欧美,为欧美文明和科学技术所吸引、所慑服,同时也为欧美意识形态所俘虏,存在崇美亲美、理论脱离实际、不问政治的纯技术观点和追逐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例如时任化学系主任刘椽说:“我的书架上,不管新版旧版,中文书一本都没有,全是美国书。……我手里拿着英文课本,口里讲着英文,黑板上写着英文,别人说‘中国文字不适用于科学’很投我的意”;农艺系副教授丁巨波说:自己“存在旧的正统和保守思想,因此研究如何进行课改的过程中,就用尽了理由替过去的课程制度辩护”;地质系副主任胡伦积说:自己“主导思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教学设备“一味向美国资产阶级大学的物资设备看齐,把美国的规格标准拿了出来。更严重的是对祖国的工业产品不相信,对外国货盲目崇拜竟到了迷信的程度”;化学系副主任阎长泰说:“在教书方面,总是主观地认为我讲的材料如果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第1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2-23页。

③ 教育部社科司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④ 《关于两年来政治思想教学工作报告》,山东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WSDB1951-1-003。

⑤ 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三反”学习代表团整理稿:《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树立起来》,《文史哲》1952年第7期。

不能与英美的课本看齐,则不够标准,同时,也显不出我的学问来”;病虫害系主任王清和认为,大学生努力的动机是“个人名利”思想而非其他;动物系副主任曲漱蕙说:自己“买办思想也是很严重的,盲目地崇信外国货,喜用原文书,看见能说洋文的人就认为是能干,我自己也拿它吓唬学生”;医学院解剖科主任沈福彭说:“自己的课程是内容丰富,完整一套,毫无可改。解剖学教的是人体结构,难道新的解剖另有一套构造不成?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根深蒂固,统治了一切”^①。又如历史系张维华说:自己“只满足于自己所搞的那点小天地,欣赏那些点点滴滴的成就,不乐意接触新事物”,从生活习惯上看,“似乎接近于封建时代士大夫的形式”^②等。第四,很多教师存留了旧的教育作风。在教学中,部分教师除了有意回避马列主义外,还存留了浓厚的旧的教育作风,如:随意请假,自由散漫;因人设课,教学没有计划;不认真对待考试;不尊重学生;教授内容不符合现实需要;等等。总之,当时山大教师的思想和心态,明显与《共同纲领》所要贯彻的教育方针不相符合,必须通过政治教育学习加以改造。

3. 华岗的教育思想是重要的主观驱动因素

华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教育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是国家构成的一部分”;教育“由社会基础决定”,同时“又跟着基础的变动而变动”;教育虽然不像政府、军队、法律等上层建筑可以迅速建立或废除,在“变动上是较慢的”^③,改革应当循序渐进,但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的变更,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才有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认为,教育应当为经济建设服务。华岗指出,不是“教育决定经济,而是教育受经济基础所决定”;教育“不是装饰品,它因社会基础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就“必须为经济服务”,为“社会生产而服务”^④。华岗认为,只有认真深入贯彻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方针,才能实现教育为现实服务的目标。所以他多次强调:“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目标问题”^⑤;而要培养出适合形势需要的建设性人才,就必须建立新的教育体系,以代替旧的大学教育体系。在新的教育体系中,指导思想最为重要,那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华岗“站在全党工作任务的高度来看待教育问题”,以“革命家的眼光来认识教育问题”,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后工作重心转变”的角度来思考教育问题^⑥,所以他反复强调说:“思想未改造好的先生,要教好书是很困难的”^⑦;“人民教师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⑧。作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教育必须为现实服务,而山大教师的思想状况又决定了其研究和教学很难达到又快又好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因此在他看来,通过政治学习改变教师的思想、树立马列主义观点,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政治大课的开设过程

1950年代,华岗的政治大课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某一固定课程为题目的大课,如《共同纲领》、社

① 田稼、丁巨波等:《山东大学教师对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自我检讨(摘要)》,《文史哲》1952年第7期。

② 张维华:《清除我的封建买办思想》,《文史哲》1952年第7期。

③ 华岗:《学习〈实践论〉和改进教学工作——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在山东大学政治讲座上的报告》,《文史哲》1951年第2期。

④ 华岗:《学习〈实践论〉和改进教学工作——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在山东大学政治讲座上的报告》,《文史哲》1951年第2期。

⑤ 台旭:《多么好的教学环境——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刘培平主编:《战士·学者·校长》,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6页。

⑥ 李玉非:《华岗与建国初期的山东大学》,《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编:《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2009年9月1日。

⑦ 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三反”学习代表团整理稿:《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树立起来》,《文史哲》1952年第7期。

⑧ 华岗:《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史哲》1952年第6期。

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二是以某一问题为专题的全校报告,如1951年5月12日的“全校师生员工三反运动总结与思想改造动员大会报告”、1951年6月2日的“学习《实践论》和改进教学工作报告”、1953年11月7日的“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报告”、1954年3月5日的“《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学说》报告”等。因专题报告比较零散,下面主要阐述以固定课程为题、笔者称之为“制度化”的政治大课。

1.1950年1-9月讲授《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课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青岛市军管会随即成立了由王哲、罗竹风、高剑秋组成的军管小组。军管小组进驻接管,6-8月组织初步的政治学习。为使全校师生认清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军管小组安排各方面人士为全校师生作时事政策报告。如6月2日,王哲作了接管后的首场报告,内容包括接管山大的方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国内外形势;6月8日,罗竹风作了“时事报告”;7月,学校组织“夏令学园”,青岛解放军司令员贾若瑜、市长马保三、团市委书记鲁钊、军代表罗竹风、教授赵纪彬等,分别为全校教职员及部分留校学生作报告,讲授时事政策、历史唯物论等。

1949年9月开学后,刘导生、孙思白、黄绍湘、郭宣霖等分别为各学院讲授新民主主义论。10月初,青岛市公安局局长葛申讲授人民民主专政。10月中旬,罗竹风作学习《共同纲领》的动员报告。11月,学校决定实行上政治大课的学习制度,由罗竹风主讲新民主主义论,并聘请华岗讲授《共同纲领》和社会发展史。12月29日,校委会发布《关于政治大课的决定》,把政治大课列为全校必修课并计算成绩。

1950年1月,在校委会的领导下,山大成立了政治大课学习委员会,由接管干部、教师、学生组成。学委会设主席、副主席,下设教务、秘书两科,科下设股,负责研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全校的大课学习。全校学员划分为5院,每院设院委会主席1人,从教师中聘请;院下分班,每班100人,人数过少者则2系为1班;每班由学委会从教师中聘请辅导员1人,由学生选举干事2人,辅导员及学习干事组织各班进行学习;学习基本单位是小组,由7人至15人组成,每组选正副组长各1人,具体掌握本组的学习情况。学习时间的支配、讨论提纲的发布、学习制度的拟定及检查由学委会负责,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由学生会学习部负责。教职员亦依照行政系统划分小组。在政治大课学习委员会的组织下,华岗和罗竹风先后为全校师生开设了《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其中华岗关于《共同纲领》的报告,一方面是对全校此前学习情况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全校政治大课的开端,影响深远。

1950年1月7日,华岗在大众礼堂以《怎样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共同纲领〉》为题,给全校师生讲授了第一堂政治大课。在报告中,华岗提出了以《共同纲领》为指导的五项办学方针:一是把旧山大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新山大,实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二是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教学方法,采取师生互助与教学相长的态度,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学习运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三是发扬民主与巩固团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适当进行思想斗争,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意识,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四是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新公德;五是鼓励全校师生努力研究与创作……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奖励优秀的科学著作及文学艺术作品,以服务于新青岛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①。报告虽然是以阐发《共同纲领》的精神为主,但是由于充分结合全校师生的思想情况,所以“讲得充实生动,而不流于泛泛,对某些错误思想有分析与批评,甚至有很严峻[厉]的批评,以致有的人感到震动”。一位老教授听后感慨道:“如沐春风,如饮甘霖。”^②第一次大课后至1月底,华岗又以《共同纲领》为题讲了两次,同样在全校引起很大的震动。

^① 华岗:《怎样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共同纲领〉》,《山大生活》1950年1月11日,第1版。

^② 孙思白:《怀念你,华岗校长》,《山东大学报》1988年5月31日,第4版。

1950 年 4 月到 7 月,华岗先后 7 次为全校师生讲授社会发展史,内容分为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专题,介绍每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阐述社会发展规律。大课的目的使全校师生尤其是教师明了并认同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弄清“历史发展的方向”,找到“做人做事的正确方向”,懂得“从发展中去看问题和解决问题”^①,从而达到让全校师生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目的。

1950 年 9 月开学后,政治大课正式开课。全校一年级新生约 800 人,半年学习社会发展史,半年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由孙思白副教授讲授;二、三、四年级学生及全体教职员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由罗竹风讲授,该课包括学习的目的与意义、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新民主主义历程等内容,目的在于使师生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提高师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的认识,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新中国的强大理论保障^②。

1951 年 3 月,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校;4 月至 7 月,学校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学习思想教育共分 4 个单元,分别是: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及坚决镇压反革命;学习世界和平理事会重要宣言和决议,订立爱国公约及准备五一劳动节大游行;学习《实践论》及开展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讨论;开展捐献飞机大炮及参加军事干校活动。在第一单元的学习中,副教务长余修作了《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报告。在第二单元的学习中,华岗作了《关于政治学习中的几个疑问和解答》的报告,内容主要是对学习政治的认识、抗美援朝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镇压反革命、响应和平理事会号召及订立爱国公约等问题。1951 年 7 月至 9 月,山大在全校教职员中开展了暑期党史学习活动。1951 年底至 1952 年秋天,“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等运动持续不断,学校不时穿插时事政策学习,但为教职员和学生开设的“制度化”的政治大课仍然没有恢复。

2.1953 年 4 月至 1954 年 9 月讲授辩证唯物论大课

1953 年 4 月,学校恢复了因院系调整而暂停的“制度化”的政治大课,重新组织学习委员会,华岗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副校长分任正副主任,各系系主任为委员。由于“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和改善学校行政工作的迫切需要”,校学委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中(实际学生也参加)进行为期一年的辩证唯物论学习,华岗担任主讲,2 至 3 周作一场报告,全校师生分组讨论一次。其间,因华岗生病和时事政策学习,大课曾经短时期中断,但是一直持续到 1954 年 9 月才宣告结束^③。

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课,共分为 11 个专题,分别是:“辩证唯物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哲学上的两大阵营——唯物论和唯心论”,“宇宙的物质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宇宙可知性及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和科学意义”,“宇宙间诸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辩证法的核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④。围绕这些专题,自 1953 年 4 月至 1954 年 9 月,华岗共作了 35 场报告。其间,除辩证唯物论大课外,华岗还作了《学习斯大林论语言学著作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特征和意义》等多场时事政策报告。

演讲是一门艺术,渊博的知识、良好的口才、随机应变的能力等都是演讲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华岗并没有因为自己具备这些要素就放弃准备。每次报告前,他都要搜集全校师生的思想状况或者

^① 《关于两年来政治思想教学工作报告》,山东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WSDB1951-1-003。

^② 《山东大学两年来思想政治教学工作总结(1949 年 7 月-1951 年 9 月)》,《文史哲》1952 年第 5 期。

^③ 华岗:《辩证唯物论大纲》,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5 年,“序言”,第 1 页。

^④ 华岗:《辩证唯物论大纲》,“目录”第 1-6 页。

建议要求,征求师生们的意见。报告作完后,他再搜集听众的反映,为下次报告做准备^①。因为准备充分,华岗讲课只带一纸提纲,他出口成章,有条有理,深入浅出,而且理论联系实际,常常一讲就是3个小时。报告记录几乎不需要加工,就可以复原成为论证严密、材料准确、语言精练甚至连引文都一字不差的论文。

辩证唯物论大课一般是周六下午在“六二广场”(山大校内广场,因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而得名)举行。每逢大课,人们纷纷来到广场,找寻最靠前的位置,以便听得更清楚一点。台阶上、树荫下、草坪中,处处坐满了拿着笔记本边听边记的人,从而形成了山大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政治大课的听众除了山大师生外,还有青岛市的机关干部、北海舰队官兵、中学教师以及工商业者。因为听众太多、场地有限,有些单位便自行发放听讲券限制听课的人数。大课开讲前和休息间隙,革命歌声此起彼伏,洋溢着一派激情焕发、催人奋进的热烈气氛。

华岗每次作报告,都有韩长经、王启新、徐经泽等人负责记录,结束后交华岗本人审定,刊登在《新山大》和《文史哲》上。其中有些专题还被《青岛日报》和《文汇报》转载,最后结集由华东人民出版社以《辩证唯物论大纲》为名出版,向全国发行。听过报告后,广大师生联系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如何办好学校等问题分组讨论,全校掀起了政治学习的热潮。如果说华岗关于《共同纲领》和社会发展史大课的影响主要还在山大和青岛的话,那么辩证唯物论大课则已经走向全国,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三、华岗政治大课的优长

华岗政治大课之所以受到山大师生欢迎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讲授大课的过程中,华岗理论联系实际,以理服人,基本上达到了对全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1. 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不为学习而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思想教育经验。基于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教育的宝贵历史经验和个人认知,华岗校长在山大的马列主义教育实践中倡导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良好效果。

首先,华岗校长倡导要清除脑海中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山大教师大多拥有根深蒂固守旧习气,不同程度地抱有不问政治的纯技术观点、超阶级观点、自由主义观点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抱有追逐个人名利思想、重视脑力劳动而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等。只有清除这些不良因素,教师的言行才有可能改变。在多场报告中,华岗指出了山大教师理论脱离实际的种种表现。1950年1月7日,在《共同纲领》第一次大课上,华岗就明确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即必须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精神,理论学习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联系山大的实际;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决不能让新旧思想“和平共居”^②。1951年5月12日,在“三反”运动总结大会上,华岗详细说明了“三反”运动的具体成绩,而且着重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概括。华岗告诫全校师生说:“小利益应该服从大利益,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战术应该服从战略,战略应该服从政略……任何时候与对待任何工作,都应该实事求是。”^③1952年初,华岗严肃批评了教学中理论脱离实际的种种现象。他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常常孤立地和片面地看问题,把自己所学得的那一点东西,当作无上宝物,有一点成就即自高自大,而且十分自负,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结果陷于故步自封。把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摆在第一位,不肯从全局和整体出发考虑问题……有许多教师的讲义,还是从欧美资产阶

① 司兆乐:《我在山大学辩证唯物主义》,《山东大学报》1996年10月16日,第4版。

② 华岗:《怎样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共同纲领〉》,《山大生活》1950年1月11日,第1版。

③ 华岗:《本校三反运动总结与全面转入思想改造的意义和方针》,《文史哲》1951年第4期。

级故纸堆中抽象地搬来的,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根本脱节。例如有些医学院里教病理学的教授,可以把非洲、澳洲等处特有的病症说得很详细,而对于中国社会所常见的病症,反而说得很简单;又如讲授植物病虫害的先生,可以把美国各地植物病虫害说得头头是道,而对于中国农村里面所普遍存在的病虫害情况,则非常隔膜;再如教文艺学的先生,对于哈姆雷特和奥勃洛莫夫等,可以如数家珍,而对于中国现代人民文艺,反而异常生疏。有不少教育工作者,都认为学校规模越大越好,院系分得越多越好,修业年限越长越好,每班学生则越少越好,把资产阶级学校那一套旧型正规当作神圣不可侵犯。如一个学院一定要分若干系,本科一定要四年毕业,医学院必须六年七年毕业,专修科一定要三年毕业,以为不这样就不像个大学。在办学方针上,很多都不是从当前国家建设需要出发,而是凭少数人的空想来定方针,甚至完全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旧规程出发。……这种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如果不加以清算和改革,我们的大学教育就不能担负起培养大量高级和中级建设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根本任务。”^①1952年3月15日合校一周年时,华岗总结说:“在实际教学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这里还占着很大的比重,在大部分课程讲授中,资产阶级思想显然还占着统治地位”^②,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其次,华岗要求广大教职员将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落实到工作之中。政治大课并不是仅仅要求大家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听课,也不是仅仅要求大家在思想上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要大家听完课后必须将学到的理论贯彻落实到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之中,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共同纲领》的学习中,华岗强调教职员必须“检查和肃清自己所有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意识,并批判那些违反《共同纲领》的思想和行动,批判山大那些违反或不切合《共同纲领》文教政策的地方”^③。华岗认为,教职员必须面对宗派主义、闹不团结和无原则等问题,并根据《共同纲领》的原则加以改正。在社会发展史大课的学习中,要经过个人自学、小组讨论、小组长向辅导员汇报、辅导员向各院汇报、学院向学委会汇报各阶段逐层逐级展开,另外还要广泛交流经验、相互探讨。例如研讨“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理论时,学校就举行了动物系、植物系、历史系、地理系等的教师联席座谈会,从自然科学方面说明人的由来,批判唯心论思想。之后,为了在实践中体悟社会发展的理论和规律,文史系参加了昌潍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农学院参加了全省的农业调查活动,地矿系参加了全省的矿产调查研究工作,土木系参加了治淮工程,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④。1951年7月18日,华岗在学习党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纠正单纯研究史料的偏向,要联系自己,检查思想作风,开展“忠诚坦白、进步团结”运动^⑤。通过党史学习,学校教职员中“有的把过去的历史进行了批判认识,有的检查了雇佣观点与作[做]客思想,也有的批判了过去友敌不分、是非不明、同仁间互不服气、互相排斥因而产生不团结的错误,也有的检查了自高自大、个人主义、敷衍疲沓等不良思想作风”^⑥。通过“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广大教职员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如中文系部分教师上课迟到早退现象“大为减少,基本上克服了”^⑦。对此,冯沅君参观“三反”展览会后说:“中文系教师们因请假和其他原因而浪费的时间的数字(二万五千多小时)使我触目惊心……从此以后,几个月来,对于上课和备课,我较以前格外的注意、努力”^⑧。如果说广大师生学习《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将所学知识和理论贯彻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了的话,那么通过辩证唯物论的学习,广大教职员工

① 华岗:《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史哲》1952年第6期。

② 华岗:《合校一年来总结和展望》,《新山大》1952年3月15日,第1版。

③ 《关于两年来政治思想教学工作报告》,山东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WSDB1951-1-003。

④ 《关于两年来政治思想教学工作报告》,山东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WSDB1951-1-003。

⑤ 华岗:《论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意义和方法》,《文史哲》1951年第3期。

⑥ 《山东大学两年来思想政治教学工作总结(1949年7月-1951年9月)》,《文史哲》1952年第5期。

⑦ 华岗:《山东大学思想改造运动总结和今后努力方向》,《文史哲》1952年第9期。

⑧ 冯沅君:《批判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史哲》1952年第9期。

以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工作,则可谓更是上了一层楼^①。

2.以理服人

思想政治教育只能通过理论和事实进行说服,而不能倚仗权势强迫学习者接受,因此必须以理服人。而要以理服人,首先必须“知识自信”,自己真正“懂理”,即真正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次必须真诚待人,凡事以善意为出发点,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不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

首先,不回避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华岗有着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有些问题并不容易讲解清楚,容易引起误解。对于敏感、难以解释的问题,他从不回避,而是迎难而上,运用自己掌握的马列主义知识为师生答疑解惑。如1951年12月18日在《关于政治学习中的几个疑问和解答》的报告中,华岗就正面解答了多个问题。一是毛泽东所说的“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否与“存在决定意识”的相原则冲突的问题;二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一部分,《共同纲领》既然承认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为什么还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三是《共同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为什么“现在又要实行思想改造,剥夺我们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问题等,从理论上为山大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廓清障碍^②。华岗的解释可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他这种不回避问题的精神和做法难能可贵。在讲授政治大课时,华岗一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性,必须采取“自觉自愿与互相启发结合”的方法,“思想问题必须用思想方法解决,如果违背这条原则,就会发生毛病,而所谓思想方法主要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③。华岗积极提倡以理服人,而且还竭尽全力、及时纠正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使其在正确的轨道上开展。

其次,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华岗政治大课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但仍然受到少数人的诘难甚至挑战,其中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最为典型。束星北是全国著名的物理学教授,与华岗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激烈的交锋。束星北说,自己“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华岗则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仅是具体的真理,而且是一切科学的科学”^④。此后,两人在政治学习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束星北经常提出不易解释的问题,华岗则不躲不避,几乎每次小组讨论会都到束星北所在的小组与其进行交流、辩论。尽管1950年代的华岗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但他却没有以行政高压的方式强迫束星北接受辩证唯物论,而是从学术的角度、以学者的身份、用学术争鸣的方式予以解决。为此,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尽量抽出时间学习物理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出版《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一书,回应束星北的挑战。在该书的“引言”中,华岗说:“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过程中,曾经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其中特别是讨论到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关系问题的时候,竟有个别物理学教授表现出很不虚心的态度,公然认为‘辩证唯物论不是普遍真理,不能应用到物理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中的微观世界,完全受自由意志所支配,根本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说,也不是辩证唯物论所能解决’的。有人居然公开声言‘自然科学应该和哲学分家’,要求辩证唯物论不要‘过问’和‘干涉’自然科学,尤其不要‘过问’和‘干涉’物理学。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声言中所包含的根本意义,这在实质上是唯心论者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一种反攻。全部科学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任何一个扬言拒绝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存心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引进唯心论。事实上凡是责骂进步哲学的人,

① 山东大学学习委员会:《山东大学教职员“辩证唯物论”学习总结》,《文史哲》1955年第2期。

② 华岗:《思想改造问题问答》,《新建设》1952年第1期。

③ 华岗:《山东大学思想改造运动总结和今后努力方向》,《文史哲》1952年第9期。

④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65-66页。

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最丑恶的哲学体系的奴隶或俘虏”^①。华岗在 1950 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提倡学术争鸣、以理服人的做法,令人十分钦佩。即便在当下,也仍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四、政治大课与 1950 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

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决策,都受一定的思想或理论支配;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良好的效果。华岗校长通过政治大课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提升了山东大学师生员工的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统一了认识,既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也营造了和谐、稳定的校园氛围。在此基础之上,全校师生共同努力,铸就了山大校史上的第二次辉煌。

1. 政治大课使全校师生完成了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变

在最初听讲“制度化”的政治大课时,教职员工往往只注意名词、概念的探讨,不联系自己的思想与实际工作,甚至对政治学习抱有不正确的看法。例如:把政治学习看成是很容易的事情,并且将其与业务学习分离乃至对立;自命清高,厌恶政治,不愿学习;如果非学不可,只好“奉命学习”等。与此相对应,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认为懂得了革命的“名词”和“术语”,就已经变成新民主主义的拥护者,不必再学习了;有人认为不应当提倡批评,说“批评”会破坏“团结”;有人觉得自己一切很完美,没有什么需要改造,山大也不必改造;还有人“接受改造的名词,打走改造的实质”等。当时,校内校外还有“山大在解放前是解放区,解放后成了待解放区”的流言。在第一堂大课之后,全校很快就掀起了学习《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的热潮,师生员工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亲历者孙思白也说:华岗“所讲的一切,我不敢说无半点失误,但就当时渴望学习的人说,都感到满足。从而对刚刚迈入新时代的师生们的觉悟提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②。由此可见,政治大课使全校师生员工加深了对党和政府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了解,基本完成了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变,从思想到行动实现了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消除了疑虑和不安情绪,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工作之中。

2. 政治大课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新领域

听华岗讲授社会发展史后,文史系教师所受震动最大,收获也最大。“他们学习后发觉自己过去研究历史,只是掌握片断的历史资料,没有把握到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以致支离破碎地陷入了考据的泥沼而爬不出来。”^③据孙思白回忆,在听华岗讲形势、讲政策、讲马克思主义、讲革命史以及其他学术专题之后,他“曾征询过几位宿学老教授的意见,他们各从自己的专业特长反映他们的感受,虽然意见不一,但总的说都认为受到了启发、开拓了思路。有位老人对我说,‘过去自认为读书得间,颇有心得,于今才知所见甚小’。还有人说,‘听一回报告,真是胜读十年书’”^④。由于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华岗的引领,1950 年代前期的山大文科学人,或者独立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者积极参与学界相关讨论,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土地制度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民族问题、《红楼梦》研究、鲁迅研究等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工具,摆脱纯粹考据模式,中外比较,古今联系,融会贯通,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而为山大赢得了“文史见长”的美誉。客观地说,解放初期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聚集了大批学术大家,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学术巨擘云集的时代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中文、历史两系拥有一批学养深厚的教授固然重要,但是在

① 《华岗选集》编辑委员会选编:《华岗选集》第 3 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603 页。

② 孙思白:《怀念你,华岗校长》,《山东大学报》1988 年 5 月 31 日,第 4 版。

③ 《关于两年来政治思想教学工作报告》,山东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WSDB1951-1-003。

④ 孙思白:《读向阳〈华岗传〉的感受》,《文史哲》1994 年第 3 期。

华岗引领下,率先利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和解读学术问题,紧紧抓住时代脉搏,构建符合时代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可能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中文系和历史系教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赢得了学界的赞许,自然科学领域教师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们通过政治大课的学习,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的学习,自觉地以唯物观点和辩证法为理论指导,使自己的研究别开生面。例如:生物系副教授黄浙检讨说,过去认为“哲学与科学无关,搞自然科学的可以不学哲学,对哲学望而生畏”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已能初步利用辩证唯物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批判有关科学的错误观点;医学院教授金泽忠认识到,“研究科学应该认识现象,理解本质,掌握本质和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理解本质在形态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才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能够运用辩证唯物观点批判费而修的“细胞病理学”的某些错误观点;数学系教授莫叶体悟到发展观点的重要,认识到辩证法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要搞好科研必须首先学好辩证唯物论,说:“我的教学与师资培养工作,如有成绩的话,应首先归功于辩证唯物论的学习”;海洋系教授唐世凤认为,“以辩证唯物论来研究海洋学,才能认识海洋的真实性,才能纠正对海洋看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海洋科学只有与辩证唯物论相结合才能使之发展成长”^①,认识到海洋具有整体性、运动性、矛盾性和变异性;童第周通过学习辩证唯物论,提出应以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与方法,来武装自己的思想^②,并总结说:“懂得了辩证法,才使我在生物研究中有了新的突破”^③;物理系郭贻诚教授认为,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论,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才能畅行无阻,事半功倍^④等。

总之,通过政治大课的学习,全校师生从心底真正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自觉地将社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与方法贯彻到教学和科研之中,而且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指导下还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新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3. 政治大课助力山东大学向新民主主义大学转轨

由于理论联系实际,学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如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这两所性质不同的学校,合并后存在种种问题和矛盾。对此,华岗认为应当各取所长,补己之短,互相学习,共求进步,应当秉承事理兼顾和舍异求同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从而较为圆满地解决了两校合并问题。又如华岗本人虽然对院系调整有自己的看法,但考虑到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在他大力领导下,学校迅速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再如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适应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响应高教部号召,山大提出了“专业教学,培养师资,整顿纪律,提高质量”的教改工作重点,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研组建立、教材建设、教学大纲制订、教学方法、师资培养、考试制度、论文写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52年华岗曾提出要把山东大学办成有重点、有个性的学校,此后根据学校师资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等种种因素,在1953年上报教育部《关于我校理、文两科发展重点与方向》文件中明确了“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办学方针。凡此种种成就的取得,没有政治大课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指导,都是难以完成和实现的。

由此可见,华岗政治大课由于特别强调政治学习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教学和科研,联系学校的各项具体工作,联系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从而统一了山大师生的思想,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顺利实现了向新民主主义大学的转轨。

① 山东大学学习委员会:《山东大学教职员“辩证唯物论”学习总结》,《文史哲》1955年第2期。

② 童第周:《生物科学与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6页。

③ 华贻芳等:《深切怀念父亲华岗同志》,《山东大学报》1980年6月21日,第4版。

④ 《山东大学百年史》编委会编:《山东大学百年史》,第197页。

五、结语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向当代学人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2021 年 5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指出,“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华岗政治大课虽然距今已有 70 年的历史,而且也存在某些不尽完善的地方,但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立场、理论联系实际的导向、马列主义大众化的做法等,无论是对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乃至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应当认真总结和倍加珍视。

Political Education Lectures by Hua Gang and Glory of Shandong University in the 1950s

Xu Chang Liu Xues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President Hua Gang of Shandong University delivered political education lectures to the whole faculty and students so as to follow out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written in the Comm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thus facilitating Shandong University to transform from an institution of New Democracy to that of Socialism. President Hua's lectures were elaborative with systema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intuitive explanation, which have greatly improved the ideological awareness and theoretical level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broadened their horizons and research fields, and laid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glory of Shandong University in the 1950s.

Keywords: Hua Gang; Political education lectures; Shandong University; 1950s; The change of academic paradigm

[责任编辑:以沫]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第 1 版。

②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人民日报》2021 年 5 月 11 日,第 1 版。